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6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只眼看延安 / 任文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6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708 - 6

I. ①第… II. ①任… III. ①延安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491 号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 巩亚男 杨 珂

责任校对 梁 菲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08 - 6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编	任文			
编委	薛义忠	石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微
	仝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自己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17种21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年3月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 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张 玲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全国全民性的战争。在此过程中，全国各族爱国人民、海外侨胞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对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而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这块西北的“禁地”，也开始和更大范围的世界接触，逐渐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但是不同的人对边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将边区视为圣地，将其赞美为东方的自由乐土，还有一些人贬斥边区是封建的割据势力，把边区批评得一无是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重要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最高领导层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在外国人、海外华人以及民主人士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观察者眼中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到达延安后，这一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特别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就再也无人能撼动了。抗战爆发后，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的这些政治军事人物领导了敌后的抗战，而毛泽东也就成了外国人和民主人士观察陕甘宁边区的首选对象。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边区内的权威是绝对的。他的画像、题字挂在各个公共场所，包括所有的工厂学校，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成为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①“他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6页。

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①，以至于赵超构在评述他时进一步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②虽然毛泽东已经获得了这样绝对权威的地位，但在这些观察者眼中，此时的他却并不是一个独裁者，甚至在很多方面，他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③而陈学昭是这样描写毛泽东的：“高高的个子，与迟缓的……笨重的脚步，使我们联想起当年北平的李大钊先生。”^④

从穿着外貌上可以看出他作为共产党人在生活作风上的简朴，而从下面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一面：毛先生“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⑤。“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⑥赵超构还写道：“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⑦作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显现出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白修德在其回忆录中对他是这样评述的：“这个人最让我着迷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风度所产生的力量。……他一讲话，发出的声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讲台上的姿态，也没有规劝的企图。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圣人。当他走起路来时，一拖一拉的，轻松自如，有点像熊的步法。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平静地坐着，让他的才智从那懒散的躯体中产生出来。”^⑧他还写道：“好像在毛泽东的胸膛里藏着一本用希伯来秘密哲学符号写成的历史书，只有他才能把它译解。他向同志们和领导人宣讲这本书，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8页。

②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6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2页。

④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⑤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5页。

⑥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2页。

⑦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5页。

⑧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告诉他们中国在走向何方，他怎样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必须做些什么。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他的精神力量是神圣的。……特别是他的意志，他个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地要看到这意志的实施，在20世纪，也许除了列宁之外，是最令人生畏的了。”^①

在这些外来观察者眼中，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显然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事实上，毛泽东不但能够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抗战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上来，而且领导全党和边区人民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一个政治作风民主、经济有很大发展、军民生活状态紧张而有序的新型社会。

陕甘宁边区的思想政治作风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敌后抗日中心的延安，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②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根据地的功能上，“根据地”的作用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往战争前线供应武器、后勤、给养和支持的安全之地。相对于提供武器、给养这些物质上的，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更重视思想的作用，“延安根据地运往前线的物资等于零，所有的战区都是自我维持。延安输出的是人，即能够传播思想的干部”^③。所以延安的主要功能是使这些干部在根据地不断地接受教育，使他们学会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利于更好地传播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便于进一步团结各地方力量投入抗日战争的事业当中。

①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05页。

②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③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9页。

虽然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的作用，但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其政治空气却并不是通常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窒息，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出比国民党统治区更多的自由和民主。1940年5月，海外华人陈嘉庚一行到延安进行访问。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府，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①“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②从陈嘉庚的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作风得到了海外华人的认同，而且在未来的建国道路选择上，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在政治上也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慧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对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黄炎培在访问之后是这样记述他的观感的：“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的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③黄炎培在总结中共的政治作风时写道：“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④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版，《弁言》第4页。

② 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2004年版，第4页。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24页。

④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中共在政治上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方面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给党内的民主创造了某种环境。边区自由、务实的政治氛围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和国内民主人士的赞扬，而且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同，白修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延安的那几周，充满了欢声笑语，令人惬意。……友谊的酒杯觥觥交错，朱德和周恩来可以不经报告，安步当车，像朋友那样到美国观察站走访，一聊天就消磨几个小时。……这是一段亲善的时期——人们豁达开朗，热情信任。……那时他们之间相互信任，渴望与我们交朋友却是真实的。”^①可见，当时的延安是一种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围，人们的心态也比较豁达，对友军也抱以非常友好的态度。

在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延安的中共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边区仍然保持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通过紧抓思想工作，使军民上下团结一致进行抗战；创造宽松、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以更高的积极性投入抗战中。

边区的经济建设活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地理、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当地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与重庆相比，这里也没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可以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差的。但是边区人民并没有坐以待毙，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的经济建设搞得却是有声有色。

在农业建设上，边区政府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苏区时代已经分配的土地，现在仍旧维持现状，而在公平的合理的融通办法中，使原来地主也能够满足。”^②对土地所有权还未确定的土地，政府颁布了人民土地所有权条例加以解决，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地主与农民间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摩擦和斗争。

①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② 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店1941年版，第9页。

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机械，农民只能运用传统的农具进行生产，但是更加注重了生产方式的改善，“多种杂粮（如麦子、燕麦、蔬菜等），开垦荒地，鼓励春耕秋收”。同时注重了土地的施肥，改良土质。粮食生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劳动的经济组织（如妇女与儿童的劳动合作社）也跟着普遍地发展起来了”^①。为了解决经济困难，除了一般农民从事生产外，中国共产党还指挥军队从事农业生产，最典型的就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垦荒。南泥湾本来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经过三五九旅官兵的开垦，变成了陕北的“江南”，所生产粮食不但可以实现自给，而且还能拿出很大一部分去支援兄弟部队。另外，边区政府还注重用生产运动的方式来发动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最有名的就是“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边区的一个农民，他积极进行农业生产，被评为劳动英雄。边区政府对吴满有的英雄业绩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号召军民都向吴满有学习，从而提高了边区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边区的农业生产虽然相当的落后，但是农民的负担却并不重。1938年，陈学昭就农民的负担问题采访了边区财政厅厅长曹菊和，并记述了采访的内容：“我问到关于农民的负担，曹厅长这样回答我：‘边区的农民也没有什么负担。土地问题，在这里，地广人稀，耕者有其田。去年，二十六年（1937年），冬天，我们发动救国公粮，这是边区农民第一次的一点负担，他们都自动地来缴，超过政府所希望的数目。原定的办法是300斤以上的负担百分之一，300斤以下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在他们是微乎其微，满不在乎的。’”^②虽然农民的生计依然艰苦，但比起军阀时代来，边区民众的生活是改善多了。“在延安，老百姓要生活，是这样的容易，一天赶赶驴子也可赚好几毛钱，因之这些本来非用气力，辛辛苦苦才得谋一饱的，现在他们发现了新的路，两个钱买进，六个钱卖出，只要经过这一番手续，钱就很容易地进来了。”^③

① 杜重远：《敌人内部严重状况的新报告》，载《抗战》1938年第66期。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③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边区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除了公营经济外，各家各户以至于政府机关、学校都要进行生产活动，这也形成了边区独特的一种经济形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在边区，无论走到哪里，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农田、窑洞，到处都有粗糙的木制纺线机。几乎是每一个人，高级的低级的，都把若干剩余精力用在纺棉线或毛线上。”^①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这种手工纺织业更加兴盛。边区从上到下，每个月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制订纺织计划，然后根据计划大力生产。当然这种计划的制订不是政府强制的，不过在那样一种全民皆生产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了这种紧张的生产活动中。总体而言，由于缺乏机械的供给，边区的手工业生产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大规模的工厂来生产人民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但这种全民生产的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在相持阶段逐渐把注意力从抗战转向对内反共之后，边区的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运动是必要的，其取得的效果也是积极而明显的，边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工矿业（如采煤、石油）、牲畜业、交通业等方面。而普通人民也逐步摆脱了贫穷的状态，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有这样的记述：“到处是新建筑，我和御秋去访问，‘你们这屋是自己筑的吗？’答：‘是。’‘有没有公家贷款给你们或是补助你们？’答：‘没有。’看各家的建筑，各式各样，可以证明这确是他们自己的建筑。”^②

整个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虽然很困难，但是在中共领导下，军民上下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边区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在农、工、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经济困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 孙承佩：《孙承佩文集》，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边区军民的生活状态

抗战的岁月是异常艰苦的，而边区军民的生活有紧张、单调的一面，也有轻松、多彩的一面。由于团结抗战的需要，人们在许多方面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

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为了生产抗战所需的各种物资，边区人民过着一种忙碌而有序的生活。忙碌也被外来观察者当作边区生活的一大特征：“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紧张的情绪还不止于生产忙，而在‘计划’的严格，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工作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计划。……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①由于工作的紧张，人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延安的惯例，是夫妇分居的，他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妇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②忙碌的工作已经成为边区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每个人，无论担任哪一种工作，都为着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

边区的生活也不全是紧张忙碌的工作，也有着轻松而自由的一面。虽然处于那样一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但是边区人民还是尽可能想出好的方式来活跃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党的大本营礼堂里举行的周六之夜的舞会。几把中国式的管弦乐器拉起来，腰鼓敲起来，口琴……就奏出悦耳的音乐，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在地板上转起了快活的舞步。……美国士兵们也离开了他们在山上的观察岗位，应邀前来助兴。”^③“活跃而自然的延安的气氛和愉快热烈而实干的八路军军人，似乎把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迷住了，他们极细致地欣赏中共单纯的毫不造作的对于客人的殷勤，在毫不拘泥形式的筵会上，著名的中国将领和他们的太太——穿着棉军装、不涂口红、不讲求社交仪式，但是快活而富于女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83页。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③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191页。

性——和美军的青年尉官及士官坐在一起，他们对她们谈他们美国的故乡和家庭。马厩似的礼堂里演的戏剧招引了成群的兴高采烈的观众；特别是在那些农村气味的星期六晚会上，人人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的男女，八路军的军官和士兵，当然还有晚会必到的美国人也参加极度紧张的秧歌舞、华尔兹舞和狐步舞。他们想到重庆统治区里新生活运动的严禁跳舞和令人窒闷的死气沉沉的情形时候就说：‘哎呀，这边跟那边多么不一样呀！’”^①这种活跃的气氛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愉悦，也使这些外来观察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整个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艰苦的斗争，不断地壮大起来，在抗战即将胜利时，面对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抉择，国共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而在一些外来观察者的眼中，国共关系的走向却早已经确定了。驻华武官谢伟思 1944 年 10 月在备忘录里写道：“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②而外交官台维斯也说：“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③而陈嘉庚更是在访问延安之后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④通过这些外国人和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但有能力领导抗日战争，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地壮大，并为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内容有删节）

① [美] G.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希望书店 1946 年版，第 213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6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6 页。

④ 《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 页。

- 1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张 玲

民主人士、华侨领袖看延安

- 002 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 俞颂华
010 访问延安 梁漱溟
023 参拜延安圣地 江文汉
042 延安考察记 陈嘉庚
065 1942 年延安参观日记 刘菊初
104 延安标准化生活 赵超构
123 延安归来 黄炎培

外国记者、国际友人看延安

- 158 在红色的堡垒中 [美] 尼姆·威尔斯
179 一位德国女摄影家眼中的延安 [中] 耶娃·萧
187 进入红色中国 [美] 哈里森·福尔曼
197 新中国的胚胎 [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230 对陕北的印象 [美] 约翰·S. 谢伟思

240 延安的政治 [美] 白修德 贾安娜

史实与考辨

256 几位国民党将领在陕甘宁边区 梁星亮

265 延安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刘立军